



明刻清补本《映雪草堂刊文杏堂批评忠义水浒全传》插图

现代快报
综合北京晚报
国家人文历史

近日,浙江一名网友称,“对中小学选《水浒》的内容做课文深感不安,中小学不能给毒小说做推广宣传。”要求从教材中删除与《水浒》相关的内容。主要理由是:污蔑丑化女性,情节不合逻辑(108好汉中,大多数是硬勾上梁山的),歌颂滥杀无辜。

对此,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回应称,《水浒》是批判性阅读的好载体,重要的不在于“读了什么书”,而在于“怎样把每本书读好”。

专家认为,只要深入文本,即知《水浒》与“污蔑丑化女性”毫不沾边;其情节合理性,被历代文豪称颂;至于“歌颂滥杀无辜”,更是无稽之谈。

《水浒》写得比《史记》还好?

版本最复杂的中国古小说,莫过于《水浒》,已知版本达130余种(上世纪80年代统计)。

《水浒》的作者、成书时间、写作过程等,众说纷纭。可以肯定的是,《水浒》故事经400多年积累,从说书人的口传文学,渐成文本,而文本亦经多人修改。因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、文学批评家金圣叹认定作者是施耐庵,遂成主流意见。金圣叹删掉《水浒》后半截,只留七十回,他认为后面部分是罗贯中写的,称:“笑杀罗贯中横添狗尾,徒见其丑也。”

金圣叹对《水浒》的评价极高,即:“天下之文章,无有出《水浒》之右者。”他甚至认为《水浒》写得比《史记》好。这绝非故作惊人之语,明末著名思想家李贽也认为:“《水浒》已胜太史公(司马迁)一筹。”

《水浒》好在哪? 金圣叹一语道破:“《史记》是以文运事,《水浒》是因文生事。”意思是,司马迁是写历史,《水浒》是造历史。

《水浒》是末世小说,呈现了末世悲凉,却直面现实,其中包含了几重意味。

其一,批评“重文抑武”的世风,导致人人虚伪,丧失豪气。

其二,揭出“官逼民反,乱自上作”,连林冲、杨志这样备受屈辱仍不愿为寇的人,最终也被逼上梁山。

其三,表达“市民阶级对于封建阶级统治者‘对内主剿’,‘对外主和’的痛恨”(茅盾先生语)。

其四,向往真性情,赞美义气。

李贽建议君主和朝廷重臣都应读《水浒》,不再使有才能的人(即大力大贤)被困下层,致天下板荡。

《水浒》译成外文后,也赢得了国际声誉。

据学者钱再强钩沉,1933年,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将《水浒》译成英文,“销售情况好得不可思议”。赛珍珠称赞说:“《水浒》之所以能够被认为是中国最伟大的三部小说之一,不是因为它充满了刀光剑影的情节,而是因为它将108个人物刻画得如此生动。在这108人中,无论谁开口说话,不用告知我们他的名字,但凭他所说的话,我们就会知道他是谁。”

《水浒》真的丑化女性?

对《水浒》的批评中,最不可思议的是称它丑化女性。

《水浒》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活的女性,对潘金莲也有客观描写,武松杀她,是为报杀兄之仇,并没否定她的“女性独立精神”。在《水浒》中,英雄们不乏尊重女性之举:

鲁智深为金翠莲打死镇关西;鲁智深为刘太公女儿怒打小霸王周通;武松救张太公女儿;李逵误以为宋江强抢民女,一怒之下砍倒杏黄旗……

而所谓“四大淫妇”被杀,均非道德原因,而是她们害人在先。《水浒》刻画了林冲对夫人的感情,杨志、宋江、卢俊义等都说过“博得个封妻荫子”之类的话,这怎么是丑化女性?《水浒》缺乏女性视角,可当时全地球的小说都如此,把现代西方文论的观点强加给《水浒》,未免荒唐。

《水浒》有时代局限,比如李逵骗朱全上山,杀了4岁小衙内;为救宋江,李逵滥杀无辜看客……不过,作为末世小说,《水浒》写的是非秩序下的状况,让李逵穿西装打领带,杀人前先确认对方是否平民,这就丧失了真实性。书中确有“滥杀无辜”,但作者何曾“歌颂”过?

小说不是思想书,不能全靠“思想如何”来定小说价值,更不能将古人的想法妖魔化。

《水浒》咋成了『毒小说』?

一位编辑“手痒”给《水浒》加标点 开启了“新阅读时代”

古人真难啊! 没有标点的《水浒》,怎么看得进去?

“古时候出版的小说,是一个标点都没有的,这样的阅读习惯延续了上千年。”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怀明介绍,直到新文化运动阶段,出版大家汪原放对《水浒》重新整理,才让古代小说有了新式标点。这一举措开启了我们的“新阅读时代”。

据介绍,新文化运动中,《水浒》《儒林外史》《红楼梦》和《西游记》都得到了不错的评价。当时提倡白话文,汪原放决定将古代小说“改头换面”,以加完标点断完句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。《水浒》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第一本被加上标点并分段后成功出版的古代小说。

分段、标点本小说出版后,引起巨大轰动,全国的出版社纷纷效仿,将分段、加标点作为卖点,一时间所有书籍都开始分段、加标点,带动了书籍版式的一场革命。

《水浒》中的那些时空错位

《水浒》中有很多“时空错位”,借助它们,后人做了一些很有趣的探讨。

好汉绕路八九百公里 为何不嫌远

史进是《水浒》中登场的第一位梁山好汉,他因结交少华山朱武等人获罪,被迫火烧庄园,前往延安府投奔师父王进。不久,史进途经渭州,与尚未出家的鲁智深结识。

这段故事里出现了几个地名,其中,少华山和延安府都在陕西省境内,两地一南一北,相距大概350公里;渭州则在甘肃省平凉市一带,位于少华山西北方400公里、延安府西南方450公里。显然,从少华山去延安府一路向北即可,完全没必要往西绕路渭州,多走上八九百公里的冤枉路。

有专家认为,作为全书最后的编订者,施耐庵对地理的书写出现严重错误,一方面是他地理知识不足,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不得不这样写——史进不绕路,没法引出鲁智深……

唐宋元明官制大杂烩

古代普通人不仅缺乏地理知识,对于官制往往也所知甚少。《水浒》中最拉风的官职,无疑是“八十万禁军教头”,听起来就像手下管着八十万禁军一样。其实不然,所谓“教头”,只是军中指导士兵练武的教师,属于没有品级的军吏。按照《宋史·兵志》的说法,从宋神宗时期起,禁军中设教头270名、都教头30名,王进、林冲就是那270人中的两个,他们的去留对朝廷来说无足轻重。

此外,书中写道,高俅征讨梁山,召集来十位节度使,这些人“旧日都是绿林丛中出身,后来受了招安”,个个镇守一方,并统率兵马。

节度使在唐朝“安史之乱”后很多都割据一方,甚至称王称帝。不过,赵匡胤建立北宋后,为避免重蹈唐末五代覆辙,把曾经位高权重的节度使,变成一个荣誉头衔,授予重要宗室或元老大臣。比如,宋仁宗次子赵昕不到1岁就被封为忠正军节度使。

而《水浒》中,随高俅出征的王焕、韩存保等十人,不过是出身绿林的武将,在真实历史中几乎没有被授予节度使的可能。

宋史学者王曾瑜注意到,《水浒》中还杂入了不少元、明官制。比如作者对梁中书的介绍是,“原来北京大名府留守司……那留守唤作梁中书,讳世杰,他是东京当朝太师蔡京的女婿”。按照作者的意思,此人本名梁世杰,在大名府被尊称为“梁中书”。实际上,在北宋,中书省是掌握实权的中央机构,一个大臣兼任中书侍郎,即成为宰相。只有在元代,随着“行中书省”(即行省制度)设立,“中书”一词才和地方官产生关联。

《水浒》的成书时间是在元末明初,从全书来看,作者显然是想让人物官职尽量贴近北宋实际,但是受限于自身历史知识的不足,只能把印象中的唐代官制、自身亲历的元明官制,与北宋真实官制捏合到一块,看起来倒也天衣无缝。

此外,《水浒》写的虽是北宋末年的事情,一些生活细节却是明朝的,像林冲买酒,用的是碎银子,这是明朝的支付方式,而北宋用的还是铜钱。

地处北方的梁山 竟盛产南方的枇杷

在《水浒》中,梁山是整个故事的地理核心。梁山地处山东省西南部,最高的主峰只有海拔197.9米。然而,有学者发现,整部小说在梁山地理常识上的漏洞多达几十处。比如,林冲雪夜上梁山,到梁山泊却看到了“山排巨浪,水接遥天”这个春末夏初才有的景象。

更令人诧异的是,“梁山泊义士尊晁盖”一回,山寨召开庆功宴,小说列出的食谱中有“山南树上自有时新的桃、杏、梅、李、枇杷、山枣、柿、栗之类”。枇杷是生长在江南的亚热带水果,不可能出现在北方的梁山。



给《水浒》加标点的汪原放



曾经的《水浒》,没有分段,也没有标点